

大學排名遊戲下的暗流：非英語系脈絡、STEM 導向與性別不平等的隱性危機

黃秀雯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張德勝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一、大學排名潮流與隱性危機

參與世界大學排名不僅能提升大學的國際能見度與聲譽，吸引國際學生與學術人才，進而獲取更多資源與合作機會促進國際化發展（Lo, 2014），也讓大學有機會與全球學術社群接軌，融入教育與研究中的多元觀點，進而鼓勵投入研究與發展，提升整體學術品質（Qiang, 2003）。此外，排名反映國家經濟能與教育實力，吸引政府與私人投資，有助於推動高等教育長期發展（Pietrucha, 2018）。上述效益使得大學排名成為強化大學競爭力與提升聲望的重要工具，在此脈絡下，教育部（2024）明確指出「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做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推動重點之一，使得「大學進榜」成為媒體關注焦點與大學校務發展的重要指標。

然而，當全球排名被國家政策工具化後，其背後所依據的評比指標與價值取向，也會逐漸帶引大學發展的方向與學術標準，使得全球大學排名不再只是外部參考工具，而是介入政策制定與大學治理的制度機制，其所建構的國際化指標，表面上追求透明與可比較性，實則強化一套以英語發表、研究產出與 STEM 表現為核心的知識規則，逐步形構出以英美菁英大學為發展典範的世界一流模型（Lo, 2014; Pietrucha, 2018; Stack, 2019）。

排名制度的風潮與價值輸出，實質上構成了知識殖民（epistemic coloniality）的治理樣態，將國際化簡化為英文能見度與 STEM（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卓越表現，使得非英語系、非 STEM 取向與在地知識逐漸被排除於主流發展軌道之外（Liang, 2024）。這種由英美主導的卓越標準，不僅透過全球排名機制滲透至各國政策場域，也藉由媒體話語與績效獎補助機制內化為高等教育發展的正當路徑（Lo, 2014; Liang, 2024）。

全球大學排名所帶來的隱性塑造效應，不僅重構大學的發展想像與知識價值，更透過看似中立、實則排他的標準化治理機制，在無形中形塑學科階層與地區權力結構。這不只是一場以學術表現為名的競爭，更是一場操作知識話語權展開的全球角力，其背後的文化霸權與結構性的不平等，正影響當前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與發展方向。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在此競爭邏輯下，大學排名如何透過偏倚的評比指標與制度設計，加劇非 STEM 領域與性別排擠構成隱性的危機，尤其是人文社會領域與女性學者更易遭受到制度性的排擠效應，而排擠源來自排名制度偏重以英文為主的國際期刊發表與引用指標，未能反映人文社

科中重視專書出版、中文論文與在地研究實踐的多元形式，使女性學者所屬學科的研究價值與成果被系統性低估（周祝瑛，2013），影響其資源取得與升遷機會。

二、大學排名指標的偏倚與文化霸權

目前主導全球大學排名場域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QS）、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HE）與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三大系統，普遍採取量化與聲譽導向的評分架構。儘管大學排名強調標準化與透明性，實則背後所建構的指標體系存在偏倚與隱性的價值導向。以 QS 與 THE 兩大排名為例，聲譽指標在整體評比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QS 將學術聲譽 30% 與雇主聲譽 15%，合計高達 45%（Quacquarelli Symonds, 2025），而 THE 則透過學術聲譽調查納入教學與研究兩大構面，合計約 34.5%（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4）。這類主觀性強烈的評量模式容易形成認知循環（prestige loop），即高排名提升學校的聲望，而增強的聲望又進一步鞏固其排名優勢，使得既有名校持續鞏固其地位（Stack, 2019）。而 ARWU 雖排除聲譽項目與教學面向，但過度依賴論文被引用次數，以及《Nature》《Science》發表篇數等指標（ShanghaiRanking Consultancy, 2024）。Pietrucha（2018）指出三大排名機制雖宣稱全球通用，實則深受語言、學科與地區文化的結構性偏倚所影響，其指標設計不僅傾向自然科學與英文出版，亦反映英語系國家特有的制度條件與價值結構，使得非英語國家、非 STEM 領域的大學在排名中長期處於不利地位。

評量規準的制度性偏倚對人文社科與教學導向學科極為不利，周祝瑛（2013）指出當研究績效被簡化為 SCI 與 SSCI 發表數與引用量，非主流領域學者將被排除於資源分配與升等體系之外，導致研究趨同及本土議題邊緣化，尤其是人文社會領域與女性學者更易遭受到制度性的排擠效應，因為國際化績效指標未考慮不同學科的出版文化與評量邏輯，反而成為知識生產排除與學術不平等的再製機制。而 Hammarfelt 與 Haddow（2018）以澳洲與瑞典為例，儘管人文學者明知其研究不適合被引用指標衡量，仍被迫迎合制度邏輯的評量標準，造成學術實踐內部的價值衝突，此現象顯示，即便是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知識場域，當排名制度滲透其中，仍會導致實際需求與形式化標準之間產生價值層面的矛盾。

排名指標的偏倚背後所反映的並非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文化與權力結構的再現。Lo（2014）指出大學排名是當前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制度工具，本質上是一套以英美為中心的知識規則，透過看似中立的標準將全球高等教育納入同質化的競爭場域，迫使各大學接受單一卓越定義與發展方向，並透過評鑑與資源分配，將各國高等教育導向至研究密集型與 STEM 優先的發展邏輯。

Stack（2019）援引 Pierre Bourdieu 的「遊戲規則」概念指出，當排名邏輯內化為學術發展的依歸，大學將難以察覺隱含其中的不平等結構，在競逐排名的過程中，背離了公平、包容與學術多元等高等教育核心價值，致使學科階序、性別排除與知識殖民等結構性危機日益惡化。此外，他也進一步批判三大排名機構（QS、THE、ARWU）可謂是由白人、男性、英語系、全球北方菁英所主導的一套世界級卓越的評分標準，形塑學術文化霸權。Qiang（2003）認為當國際化與排名績效高度連結時，容易讓非英語系、非 STEM 學科遭到結構性排擠與邊緣化，也削弱了大學公共性的教育責任。

Liang（2024）觀察到臺灣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著實受大學排名邏輯之影響而驅動政策轉變，該計畫以補助全球鏈結型大學及研究中心作為資源配置的核心，雖聲稱旨在增強國際競爭力，實際上卻強調英文發表、研究產出與國際合作等可量化的評估標準，並將資源優先分配給研究型大學與 STEM 領域，進而使專注於教學型、文化導向及本土貢獻的大學逐漸被邊緣化，導致學術資源更加集中並加劇學科間的失衡問題。

總體而言，大學排名建構出的量化與標準化表象，表面上強調客觀與透明，實則蘊含深層的文化霸權與制度性偏誤，成為隱性地全球治理機制，重塑大學資源配置、知識價值與學術任務。全球排名制度背後的知識邏輯，將白人、男性、英語視為學術卓越的象徵符碼，進而形構成單一化的知識範式與晉升標準，不僅排除了非主流地區與語言的知識實踐，無形中更是鞏固男性主導的學術階層，進一步將女性與邊緣學科學者排拒於資源與能見度核心之外。

三、從資源傾斜到性別不平等，STEM 導向下的隱性排除效應

全球大學排名與高等教育政策普遍將研究產出與國際能見度作為核心評量標準，促使 STEM 領域成為資源分配與政策支持的優先對象。相對地，非 STEM 學科則面臨被邊緣化的結構性困境（Liang, 2024；Lo, 2014；Pietrucha, 2018）。以研究量化與國際期刊發表為主的評鑑邏輯，忽視非 STEM 領域常見的專書出版、中文學術期刊、在地語言與長期耕耘型的研究形式（周祝瑛, 2013；Hammarfelt & Haddow, 2018），使其難以被納入主流排名評比系統，也削弱其在資源競爭與學術能見度上的正當性。如 Qiang（2003）所強調的當國際化簡化為英語發表與量化績效，將忽略跨文化學術對話與教育公共性，進一步排除非 STEM 取向的知識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STEM 導向的發展模式與評鑑邏輯，不僅在學科之間製造資源失衡，也對性別結構產生深遠影響。由於女性學者多集中於非 STEM 領域，當這些領域在排名評鑑中長期處於不利位置時，將使女性在學術能見度、資源取得與升遷機會上面臨結構性障礙，進一步加劇高等教育場域中的性別不平等。雖然 STEM 領域亦有女性表現優異，但整體而言，女性學者集中於人文與社會

科學等非 STEM 學科，當這些學科在評鑑與資源分配中處於不利位置時，將間接限制女性在升遷、學術影響力與研究資源上的發展空間（周祝瑛，2013；Stack, 2019）。Stack（2019）認為全球排名機制不僅強化 STEM 卓越形象，也進一步形塑學術成就的性別想像。因 STEM 領域長期呈現男性高度集中，女性參與比例偏低，該機制逐漸構成一種以男性為主體的成功典範，將學術卓越與陽性特質相連結，排除非 STEM 領域與女性學者的多元實踐。Liang（2024）亦觀察到臺灣「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在資源配置上高度傾斜 STEM 領域，致使女性比例較高的教學型與文化導向大學被邊緣化，進一步深化學術場域的性別階層。Viarengo（2021）則從歐洲觀察指出，性別刻板印象與社會規範明顯地影響女性進入 STEM 領域的意願與機會，形成跨國共同的結構性障礙。

綜合上述，大學排名所建構的 STEM 導向發展模式，不僅是重構，而是將其導向以競爭與績效為中心的學術價值體系，也加深學科與性別的制度性排擠。唯有在國際化與卓越標準的重新定義下，納入多元評量與性別觀點，才能回應高等教育的公平性與社會責任。

四、結語與建議

全球大學排名不僅是學術評比工具，更是一場重構全球知識體系與教育價值的競賽制度，引導學術機構追求研究產出與國際能見度，更深層地重塑了知識價值與學科階序。表面上看似中立的標準化指標，實則內含對英語發表、量化成果與 STEM 表現的偏好，使高等教育在「卓越」的名義下，逐步朝向單一化與競爭化發展，造成隱性塑造效應，使非 STEM 領域的人文社會科學被邊緣化，長期處於資源不足、評鑑不利的處境，不僅限制學術多元與在地知識的發展，也削弱大學回應社會需求與公共責任的能力。

針對大學排名機制所帶來的隱性危機，本文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政策層面：教育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視「國際化」與「卓越」的內涵，避免以單一化指標主導高等教育發展。應建立具備文化敏感性與學科適切性的多元評鑑機制，保障不同類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空間。

（二）學術層面：依據各學科特性推動出版與在地相關學術貢獻機制，提升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能見度，並發展多元路徑的學術評價平台，避免被英語化與 STEM 導向的主流評鑑架構邊緣化。

（三）性別與公平層面：強化女性學者與非 STEM 領域的資源保障政策，將性別平等與學科多元納入高等教育評鑑核心指標，避免排名邏輯持續再製性別與學科的不平等結構。

綜觀高等教育場域中性別與學科間的不平等現象，並非意指女性僅限於非 STEM 領域，或男性僅屬於自然科學範疇。事實上，人文社會科學中亦有大量男性研究者，而 STEM 領域中也不乏女性學者表現卓越。問題不是個體選擇的差異，而是當前大學排名機制與治理邏輯如何透過制度設計與文化價值導向，造成的資源分配的傾斜與學術評價標準，導致結構性不平等。因此唯有跳脫「排名至上」的治理框架，重建多元、公平與公共導向的高等教育價值體系，方能恢復大學作為社會知識公共場域的本質，回應教育的多元性與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 周祝瑛（2013）。大學評鑑中 SSCI 與 TSSCI 指標對台灣女性學界人士之挑戰。《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11)，1-8。
- 教育部（2024）。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112-116 年）。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Plan_Content.aspx?n=D33B55D537402BAA&sms=954974C68391B710&s=333F49BA4480CC5B
- Hammarfelt, B., & Haddow, G. (2018). Conflicting measures and values: How humanities scholars in Australia and Sweden use and react to bibliometric indicator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9(7), 924-935.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02/asi.24043>
- Liang, J. (2024). Educational improvement to whose images? A coloniality perspective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13(1), 1-11.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177/2212585X241242519>
- Lo, W. (2014). The ranking phenomen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academics in Taiwan. *High Education Policy*, 27, 259-277.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57/hep.2013.22>
- Pietrucha, J. (2018). Country-specific determinants of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Scientometrics*, 114, 1129-1139.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07/s11192-017-2634-1>
- Qiang, Z. (2003).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2), 248-270.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2304/pfie.2003.1.2.5>
- Quacquarelli Symonds. (2024).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5*:

Method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

■ ShanghaiRanking Consultancy. (2024).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Methodology 202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hanghairanking.com/methodology/arwu/2024>

■ Stack, M. (2019). Academic stars and university rankings in higher education: impacts on policy and practice. *Policy Reviews in Higher Education*, 4(1), 4-24.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80/23322969.2019.1667859>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4).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5: Method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5-methodology>

■ Viarengo, M. (2021). *Gender Gaps in Education: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ENEE Analytical Report No. 46). European Commission.

